



战时胶东东部的三所革命学校

□曲延科

东海中学的教育质量很高。1946年底,初中部二、三年级毕业生大都升了学,考入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山东建设大学、胶东化学研究所、山东军政大学等;转业军人大都回到部队,也有的调到地方党政机关,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



胶东实验小学。

胶东实验小学就如一座熔炉,炼出一批纯钢,用作国家的栋梁之才。从这个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生,奔赴全国各条战线,参军参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突出贡献,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在胶东解放区建立了多所革命学校,仅在牟平周围就有胶东实验小学、东海中学、二牟联中、文牟联中、胶东公学等中、小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为反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反动教育起到重要作用,也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下面谨介绍其中的三所学校。

历尽磨难的东海中学

东海中学是东海行政专署于1941年3月,在昆崙山东麓的楚岬村(今属文登)创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其办学目的,除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外,主要是培养党政军干部和为根据地学校培训教师。因时局动荡,学校不时在文登、荣成、牟海(今乳山)三县流动,1944年7月被迫停办。1945年秋,牟平县城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1946年春,东海中学又在牟平县城的城隍庙恢复办学。

东海中学在牟平县城恢复时,在校学生有初中部一年级六个班和二、三年级各一个班,共有学生370余人(二、三年级部分学生是从原校转过来的),学制两年。这一年还办了三期教师短训班,每期三个月。1947年春又招收了三个长期师范班,学生130人,学制一年。初中部的学生多是完小毕业生经过考试录取的,师范部学生多是从解放区选调的小学教师、基层积极青年和妇女干部,另外有少数残、转军人也安排在初中部和师范部就读。在校学生中,小的十四五岁,大的近四十岁,有的已结婚生子。这期间,学校校长是孙景华,由东海专署教育处委任;教务主任李季君,副主任赵涛;教导干事若干人,负责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总务主任鞠范民,会计、出纳、保管、事务等若干人,负责学校财务、师生生活;还有医务室,有医护人员二人。学校教师四十多名,除了党组织安排的教学骨干,还有来自各类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以及从日伪学校接收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学科除了没有外语,其他与现在中学课程基本相同,有国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体美,时事政治占课时较多。教材主要是自编、摘编讲义。办学经费由东海专署批拨,学生食宿费由昆崙山织布厂提供,牟平城东老人仓村有二十多亩地(公产)提供部分粮食和蔬菜。教师工资(每人每月300小米)、学杂费、讲义费、学生伙食费都是通过这几条渠道解决。学生吃的是地瓜干、玉米饼子、豆面渣和萝卜、白菜汤,白面很少见。中学部学生基本走读,师范部学生住宿,没有床,都是就地铺麦秸草。学生大多数只有一床被子,冬天卷着筒睡,夏天拆成单片盖在身上睡。城隍庙地势低洼,非常潮湿,睡在城隍庙大殿里的女生大多生过疥疮。

学校的教育质量很高。1946年底,初中部二、三年级毕业生大都升了学,考入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山东建设大学、胶东化学研究所、山东军政大学等;转业军人大都回到部队,也有的调到地方党政机关,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

1947年夏季,国民党进攻胶东。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和轰炸,学校搬到城小曲家庄村和城东三官庙。当年9月,敌第二十五师进驻烟台(现芝罘区)、牟平,形势进一步恶化,校部迁至牟平城附近40里的曹格庄村,学生全部疏散回家。1947年12月,东海中学东迁至离牟平县城100多里的文登县于家埠村,继续开课。这次开学,到校的学生只剩下200多人,大多是原解放区入学的学生。这里的条件更差,无教室无桌无凳,学生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就地铺麦秸草,白天当教室,晚上当宿舍,授课方法是老师讲、学生记笔记。一开始,同学们有的趴着写,有的跪着写,后来都学会了在膝盖上写。那时蒋匪军已占领烟台,徘徊在牟平沿海一带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敌我斗争十分激烈,学校的学生班长多是地下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学生大都是进步青年。他们政治上都很敏感,阶级斗争观念强,既是在校学生,又是革命工作者,积极加入党在农村的各项工,边读书,边积极宣传党的土改豪分田地政策,动员青年参军支前,与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反动言论作斗争。遇到个别教师因家庭成分高而受到冲击散布不满情绪和社会上“特嫌”分子散布反动言论,学生们都能及时进行宣传教育和批评斗争。因此,敌对势力对东海中学的学生恨之入骨,总是伺机报复。1948年新年那天晚上,全校师生晚上吃的白面馒头被敌特分子下了毒,幸亏驻在学校附近的东海专署医院立即组织抢救,才没有死人。当时由于形势紧迫,此案没有来得及侦破。

由于形势继续恶化,学校于1948年1月中旬(腊月二十三)宣布停办。同年11月底形势好转,学校又在文登县许家埠村复学。至1950年夏季,坎坎坷坷历经十年的东海中学最终停办。

根据地小学的楷模——胶东实验小学

胶东实验小学(简称“胶东实小”)由胶东行署于1943年在牟平县凤凰崖村(今属乳山)创办,同年迁入牟平县埠西头村,与埠西头小学合并,名称仍为“胶东实验小学”。胶东实小与胶东军区司令部住在一个大院内,这里原来是一户地主的家,有十几间房屋,南厅住着许世友司令、警卫员和司令部参谋处,正房为胶东实小所用。

胶东实小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办学宗旨是:通过教学实践,创造总结抗战时期的学校教育经验,用以全面推广;为党政干部子弟、亲属及胶东各机关在反“扫荡”中不能随机关迁移的少年儿童提供学习场所;培养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知识的



东海中学学生。

革命工作人员。

胶东实小由胶东行署干部李国屏任名誉校长,郑铭石任校长。1944年,郑铭石调胶东行署工作,曲克继任校长。同年,曲克调任牙前县教育科科长,刘任之继任校长,直至实验小学撤销。胶东实小配备教导主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教导主任负责师生的思想品德和纪律教育;教务主任专司师生教学业务;总务主任分管财务和后勤。教导主任由刘任之兼任,教务主任是林晓枫,总务主任是孙建华,干事是黄海。教师由胶东各县机关、学校选拔素质较好的知识分子充任,其中有不少文登、莱阳乡村师范毕业生,如语文教师孙凤巨、算术教师邹本野、史地教师王吉光、音乐教师矫秀清等,教学水平都很高;还有修孟干、孙劫之、刘凤梧、王白石、黎岩等老师,都曾先后在胶东实小任教。

学校共有学生200余名,一、二年级合编为复式班,三、四、六年级各设一个班,五年级设两个班。学生分公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公费生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亲属,少数是机关放下的年少体弱小兵。公费生年龄较大,多在五、六年级就读,其中有许世友司令员的爱人,姓田(后改名田普);东海军区司令员于克恭的儿子;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的妻妹蔡英萍;海军司令部郑道济的儿子;牟平县长郑省农的妹妹郑慎之;胶东国防剧团领导人栾少山的儿子栾紫然;国防剧团演员曲云;胶东报社译电员刘思仁等。这些公费生虽然年龄不大,但政治上都比较成熟,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学习极为认真,大多数都是班里的优秀分子。毕业后,胶东行署分配工作,中途调回原单位或参军参政的也有。自费生是埠西头村和周围方圆二十多里村庄招收的学生。当时学校周围村的孩子都愿意到胶东实小读书,因为学校不但传授文化知识,还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质量远非一般学校可比。自费生中优秀分子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自费生学生会主席杨玉洁(女,下杨家村)和姜秀英等都是品学兼优学生的代表。

学校经费由胶东行署拨款供给。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学校有三四亩地,主要种粮食。另有半亩地栽蓼蓝(草本植物,形如黄烟,采叶泡汁能染蓝布),收获后拿到市场上卖,以补充饭费之不足。

为适应战争环境,胶东实小坚持教学为抗战和生产服务,结合战争和生产情况制定教学计划。拥军、反“扫荡”、坚壁清野、抢救抢种、卫生防疫等,都是重要学习内容。对于文化课程,除语文、算术等主科,其他学科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特点爱好自主选择,但教学体系不变。有敌情时,课堂搬到野外,一边反“扫荡”或生产劳动一边读书,学习和活动互相促进。同时,学校将编写的黑板报及时对外展出,向群众做宣传。学生自编自演的小话剧、小歌舞也经常到驻地部队和农村慰问演出。胶东实小学生参加胶东军区举行的“胶东英模代表大会”“任常伦烈士追悼大会”等大型活动,表现都很出色。在任常伦烈士追悼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致完悼词后,胶东实小学生倪照文还深情地指挥大家齐唱了追悼歌。

在教学与管理方面,胶东实小根据少年儿童好学、好奇、好胜、自尊的特点,摸索总结出“四原则”的教育方法:善于发现学生优点,多表扬、少批评的鼓励性原则;用暗示的方法引导学生自觉改正缺点的暗示性原则;顺应儿童天性引导学生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因势利导原则;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反复训练原则。这些经验不仅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就连敌占区不少学校也前来学习。1943年12月寒假期间,牟平县组织104名敌占区学校的教师在埠西头村举办了20天训练班,推广胶东实小的办学经验。

胶东实小在抗战胜利后迁至莱阳。这所学校在牟平只存在了三年多时间,不仅创造出许多战时办学经验,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1996年夏天,曾经在胶东实小读书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同志,专程去埠西头村寻找当年的踪迹。他说他是作为干部子女在胶东实小读书的,尽管时间只有三年,却为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因为,一来胶东实小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学到好多新文化、新知识;二来学校与胶东军区住在同一大院,与胶东行署、军区医院和好多政府部门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经常见到首长和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看到进进出出的伤病员,耳濡目染,从小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特别是参加战斗英雄任常伦的追悼大会,心灵受到很大震撼,从小就立下革命志向,要参军杀敌,为革命烈士报仇。他说当时胶东实小毕业的学生不仅公费生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自费生也有不少参加了革命工作。胶东《大众报》曾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胶东实小学习英雄精神、踊跃参军参政的事迹。

高峰在《回忆在胶东实验小学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实小就如一座熔炉,炼出一批纯钢,用作国家的栋梁之才。从这个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生,奔赴全国各条战线,参军参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突出贡献,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实小的老师,一部分仍在教育战线培养人才,一部分参军参政。就我所知,新中国成立后,陈日新老师曾在《大众日报》任职;郑铭石校长调任省教育厅厅长,后调至山东师范大学做领导工作;刘任之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供职;李岩老师去了延安;矫秀清、王白石老师夫妇二人同调天津市委宣传部。”

一所军事化学校——文牟联中

文牟联中是我东海区行政公署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发展需

要,于1944年6月以原二牟联中为基础扩办的一所初中,师范混合学校,校址在文登县小观村。原二牟联中由东海行署于1943年8月创办,地址在牟平县由古村(今属乳山)。二牟,即牟平、牟东二县。牟平于1947年10月分为牟平、牟东两个县,1948年6月又合并为牟平县。

文牟联中有教职员100余人,校长胡湘夫,教导处主任刘仁,总务处主任官树华,教师王力平、姜耀华、刘恒、王素芝、刘德川等。指导员有梁斌、丁宁(女)、祝立。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指导员都兼课。学生设四个中队,师范部、初中部各二个。师范部六个班(也称分队),初中部六个班,在校学生有700人左右。课程设置有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音乐、美术、军事、体育、生理卫生等。教材由学校自选、自编、自刻蜡纸油印。

教师和学生来源:领导成员和政治、军事教员、指导员是从地方政府和部队派来的党员干部;文化教员则是从根据地吸收来的具有高中、大学文化和抗日爱国热情高的知识分子,有些人来校前就是中学教员。这些教员以非中共人士居多。学校学生,一是根据地高小毕业生;二是由党政军部门转来的具有高小文化程度青年;三是从敌占区来的爱国青年。

学校都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桌椅,以树林、场园、祠堂为课堂。上课时,学生席地而坐。每班有一块黑板,上课带来,下课带走。文化课以班为单位授课,军事、体育、政治课则以同级为单位上大课。学校没有集体宿舍,师生男女分别住在群众家里,铺麦草,睡地铺。遇到敌人“扫荡”时,学生就化整为零,分散在群众家里。

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教职员每月工资一百多斤粮食,包括伙食费、服装费。学生一律吃公粮,服装、被子除党政军部门转来的和生活困难的享受公费待遇外,其余学生自备自带。师生就餐很清苦,口粮以粗粮为主,一年到头吃盐水、喝菜汤,偶尔改善生活就是吃顿饺子。反“扫荡”期间,师生都分散在群众家里,把菜金、粮票交给群众,与民同吃同住。师生如同军队般过军事化生活,作息时间和出操、吃饭、上课、自习、晚点名、睡觉等活动,都按八路军模式严格管理;开荒生产,做群众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条件虽艰苦,师生却以苦为荣,士气旺盛,团结上进。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根据地的建设,军队建设培养输送人才。”政治教育,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注重学生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抗日信心。军事教育,在学好《论持久战》等理论的基础上,教授学生列队、行军、宿营、站岗放哨等军事常识,同时引导学生走出校门锻炼。1944年暑假,文牟联中组织两个连参加由胶东区委、行署组织的胶东根据地所有中学的男生(年小体弱者除外)学兵团,到抗大参加两个多月的军事训练。两个连的连长由抗大派员担任,指导员由学校杨坤、牟芳担任。下半年,学校又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军、办夜校、扫除文盲等社会活动,提高学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为学生踏入社会打下基础。

学校党群建设。文牟联中设立党总支委员会,书记曲力,委员王本贤、王素芝。每个学生中队设立党支部,中队指导员兼任党支部书记,各班(也称“分队”)设党小组。学校党总支书记身份公开,党员和党的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党组织在学生中秘密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秘密开展活动。在学校党总支领导下,成立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各班设分会。总会和分会均设学习、宣传、文娱、保卫、群工、生产等委员。学生毕庶模、李新民、林晓(女)、于树梅等曾担任过学救总会主席和委员。学救总会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学生群众工作。

学校进行过一次整风运动。1944年冬,胶东区委党委指示,学校开展整风运动,至1945年2月结束。此次整风把1942年延安整风中康生创造的“抢救失足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左”的错误照搬过来,在教师 and 青年学生中采取“车轮战术”,搞逼、供、信,揪所谓日特、国特、托派分子,使不少从根据地和敌占区来的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员,学生受到冲击和迫害,不少人因受不了“车轮战术”的折磨而乱说一通,承认自己参加过青团、国民党和日特、国特等反动组织,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虽然运动后期东海地委发现了这些错误并予以纠正,但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不少学生背着此次整风所搞的不实材料档案,走上工作岗位,影响他们入党、提干,个别人甚至成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必受冲击审查的对象,给他们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也给党带来重大损失。

1945年5月初,为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东海区委、行署要求学提前毕业,6月底完成学生分配,此后不再招生。

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采取自愿选择和组织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大方向是参军到部队或参政到地方。学生的首选多是参军。被分配到胶东军区教导团、鲁南抗大一分校、胶东军区参谋训练班、胶东军区机要报务训练班、部队卫生学校和到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工作的,共有460多人,占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参政到地方的学生,有的分配到胶东建国学校学习,有的分配到新闻训练班学习。仅有少数学生被分配到根据地农村小学教书。临别时,学生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抗大毕业歌,流着激动的眼泪互相告别,恋恋不舍地离开学校,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些学生出校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单位的骨干力量,为部队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風景

乡戏

□程绍堂

20世纪70年代前,农村文化生活匮乏,乡村夜戏成了农村最受欢迎、最为普遍的文化生活,几乎村村都有戏班子和土戏台。演员是本土土生土长的,戏台是用石砌砖筑,或用泥土夯成的。过年正月十五这段时间,村里的戏班子几乎天天都有演出,陆陆续续一直演到正月底,你来我往,相互串演,不亦乐乎!

我们村虽然是个百余户的小山村,可演戏的积极性却很高,《龙凤面》《罗衫记》《搜书院》《墙头记》《王定保借当》《王小赶脚》《小姑贤》《王汉喜借年》等传统吕剧都演过,不但剧目受欢迎,而且演出水平令人称道,在四邻八乡颇有些名气,一度成为竞相邀请的香饽饽,一个正月几乎不闲着。

排乡戏,是最早的“年味”。每年到了冬闲时节,尤其是进了腊月门,村里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排戏。学校放假后,教室成了村里排戏的场所。最先得知排戏信息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们,排戏伊始,就开始探班。排戏是避免闲人干扰的,门不让进,可窗户你不能堵上。于是,窗户被小脑袋一层层堵了个严实。窗户一堵,屋里光线暗了,影响排戏,人家便赶着走,无奈,只好远远站着听。

进入腊月二十后,排戏进入高潮,已经动了丝竹锣鼓,声音很远就能听到。离过年还有三五天,开始搭戏台,戏台的四个角埋下四根对掐粗的木杆,木杆的顶部拉上几根用来悬挂布帘的绳子,简易的戏台就算搭建好了,看戏的日子也就快到了。每当此时,孩子们便激动不已,奔走相告,戏台成了他们嬉戏玩耍的场所。

大年初一晚上,村里的乡戏正式开台。太阳还没落山,就有人在戏台前摆上凳子、木墩等占据了中心位置。夜幕降临,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出来了,络绎不绝的人们扛着凳子、骑着马扎,呼儿唤女,从四面八方涌向戏场。周边村的人也结伴而来,人一拨接一拨,大呼小叫此起彼伏,给夜幕下的村庄增添了无限的热闹和喜庆气氛。

最活跃的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开戏之前,他们像传火龙一样,四处乱窜,追逐嬉戏,雀跃欢叫,胆大的时不时跑到台上翻跟头,做鬼脸,手持木棍练对打,溜到台后看演员,一掀布帘,演员还在化妆呢。“去去!”孩子们吐一下舌头,又窜到别处去了。

坐在戏台前最前面的大都是本村扶老携幼和上了年纪的人,青壮年和外村人多半站在后面和周边,脸皮厚的小伙子使劲在人群中向前挤,猴儿精的孩子则爬上了周边的树杈和墙头,站在边远处者则在人丛中踱来踱去,碰上亲朋好友,争着掏出廉价香烟,互让一番,然后你一支,我一支,边悠然的吸着烟边闲聊……这种场面和氛围,是庄稼人最难得的放松时刻。

突然,清脆的报幕声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戏台,戏场顿时安静下来,乡村的夜戏就在这热乎乎、暖烘烘的特定气氛中开演了。

上了岁数的人看戏最专注,完全被剧情所吸引和感染,易于共鸣伤感:看到贤士忠臣蒙冤落难,奸佞小人残害忠良,便义愤填膺,痛恨昏君无能,怒斥奸臣狠毒;看到孤儿寡母患难或义女蒙冤,同情的泪水会止不住地流;看到抛弃糟糠之妻或恶妇虐待公婆的情节,心中的委屈和哀愁便涌上心头;看到欢乐开心处,又会笑出泪来……一场戏下来,悲愤的泪、同情的泪、伤心的泪、欢喜的泪,会沾湿袖头。

演出开始,孩子们在大人的叱责声中安静下来,没过多时便倚人而眠或在大人的怀中睡去。一阵紧凌的锣鼓声将孩子们从梦中惊醒,有的揉着惺忪的双眼急着要撒尿。望着四周黑压压、水泄不通的人群,大人只得让孩子就地解决,顿时一股淡淡的尿骚味扩散开来,但却丝毫不影响周围看戏人的兴头,根本没有人去理会。

年轻人对看村戏似乎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对戏场这种场合却求之不得。有情有意的年轻人会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选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站定,悄悄说着情话,一场戏下来谁也说不出口的是啥。最不专心看戏的是那些到了谈婚论嫁年纪的小青年,尤其是单相思的愣头小伙,旁若无人地贴着脚伸长脖子在人群中搜求“心中玫瑰”,发现目标就毫不顾忌地朝着目标挤去,使人一阵波动,惹得众人怒视,啧啧有烦言。那些热恋中的情人更是如鱼得水,上哪找这天赐良机,说是看戏,倒不如说是相会,不等戏开演,就躲着人们的视线,迫不及待地牵手溜走,寻找属于二人的小世界。这时,草垛成了最佳去处,避风、静僻、无人搅扰,非常适合恋人卿卿我我,伴着他们的只有繁星和阵阵的乡戏锣鼓声。

过了正月初五,也称“破五”,村与村之间开始交流乡戏,你来我往,有时还暗较劲,看谁演得好。啥叫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谁演出时台下观众众多。为保证演出时不冷场,不丢面子,挣得个好名声,村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上村里一些人跟着去充数,名曰“护台”,捧人场,以壮声威。我虽没跟着去“护台”,但听到村人议论前一天晚上在哪村演出,看戏的人老鼻子了,叫好声不断时,既高兴又自豪。

过好完五,戏台上的木杆被挖走,一年一度的乡戏也就宣告结束。村民们尤其是孩子们意犹未尽,惋惜地看着被拆卸的戏台,那股兴奋的心劲,这才慢慢地平复下来。

如今,这种乡戏在农村越来越少,这种气氛也越来越淡。然而我总觉得,无论什么演出,都无法表达乡戏烘托出的那种特有的乡情和味道。



农历正月十五,福山区元宵节举行大型民俗表演活动——“秧歌进城”,让很多老年人想起了当年的乡戏。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摄